

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

大众写、写大众、大众享用,大众由原来的欣赏者变成参与者。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

近年来,“新大众文艺”迅速破圈。“十五五”规划建议明确提出,“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”。在文学领域,大众写、写大众、大众享用,大众由原来的欣赏者变成参与者。

“谁”在创造新大众文艺?最近,在一场关于新大众文艺的讨论中,中国人民大学

文学院副院长杨庆祥作为主持,提出了这个主题。不必赘述,这个“谁”不是个体,而是一个整体,即人民大众。他们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深度,参与文学艺术的生产、传播,改变和塑造一个时代的文艺形态和精神状态。文艺大众化的新浪潮令人动容,也引发我们思考:是什么造就了今日的繁荣景象?新媒体技术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发挥作用?它的未来将走向何方?

杨庆祥把新大众文艺放在一个“短历史语境”中来讨论,“那么多写作者,研究者,很共情,可共鸣,这一定与当下密切相关”。

既然是新大众文艺,创造者肯定是“大众”,再问“谁”,似乎显得有些多余。但在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岳雯看来,“大众”概念

“谁”在创造新大众文艺

具有复杂性 & 流动性,定义因领域而异。“在文学界,它是扎根生活的底层力量写照;在影视界,它与流量共筑传播热潮;在网络文学,它是数字原住民的鲜活代言。”

就像“盲人摸象”,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领域看到大众的一部分。那他们有什么共性?岳雯的观点是——人设化与人物化的合拢,即他们是虚拟符号与现实人物特质的混合体。快递小哥在书中写的依然是快递小哥,但书中的虚拟人设和现实中的真实人物是否完全统一?恐怕还需要更多观察。

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徐刚说,事实上,“大众”一直都在。之前的“素人写作”,一度被理解为体力劳动者在写自己的经历。于是,曾有人提出一个有趣的假

设:假如1987年余华没有发表《十八岁出门远行》,而是写了《我在海盐当牙医》,这不算“素人写作”?

因此,新大众文艺的文学,并不能狭隘地理解为“底层写作”或者“素人写作”。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晓琴回忆起自己在2000年左右大学刚毕业后,就在互联网论坛上写小说,“按现在分类属于穿越小说”。“如果仅仅把新大众文艺局限于‘底层写作’,就狭隘了。我也是大众,我也在创作,我现在还喜欢在朋友圈写诗。”张晓琴说,她更愿意将新大众文艺定义为“一种时代的精神状况”和“一种文艺存在的形态”。《新华文摘》文艺评论主持、编审陈汉萍补充道:“创作主体是双向的:一方面包括保安、保洁员等素人作者;另一方面也涵

盖专业作家的大众化。”

“谁”在创造新大众文艺?这里的“谁”,不仅是作者,还包括媒体、市场、读者,等等。在新大众文艺的生产过程中,每个元素都是“谁”的一部分。

海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李音认为,数字技术的发展正影响着新大众文艺,让其生产、传播、消费发生全方位变革,“不仅作者和读者难以区分,生产和消费也难以区分”。新大众文艺的传播既承载着延安以来的历史能量,也暗含构建自主文化体系、彰显文化自信的时代诉求。

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大先跳出文学,从经济与美学的双重维度分析。从经济维度,新消费主义让消费回归本真;从美学维度,新大众文艺的创作促成

新大众 新文艺 新故事

普通人的写作正在补足无数种人生在文学世界的空白。

中青报·中青网见习记者 陈宇龙
记者 蒋肖斌

在陈朴的家乡——陕西宝鸡的一座书城,陈朴的新书《从修剪工到群众演员》占据书架一角。他在书里写道,曾经在这家书城批发部做了5个月打包、送货的工作,文学幻想未曾间断,“在心里暗暗发誓,有一天一定要出一本书,摆在这座书城的展厅里”。

这本非虚构新书是陈朴青年时期打工10年、换了14份工作的记录。他去过广东东莞、陕西咸阳、江苏常州的工厂,在制造业重镇留下手印;也在家乡干过汽车装潢店员工、司机、小商品批发部员工等工作,在地方经济的业态里腾挪。他说,只是想记录下它们,作为一份资料,亦写给内心。

每段工作经历里,都有支撑他的“文学时刻”:2004年,在东莞的网吧,看到自己网络投稿的诗阅读量超过1300;2009年上大学当保安,休息时脱下制服,在图书馆电子阅览室登录博客写诗,后来还进了文学社,成了“名誉社长”;2011年第三次进厂前,常州的一位诗友开车接他,两人聊全国各地活跃在博客上的“代表性诗人”。在为生活四处奔波的日子里,因写作换取的稿酬、结识的朋友,让他在工友面前有了自信。

陈朴很早就开始读非虚构作品,真实的人生比小说更能带给他震撼,让他把所有经历看作人生财富,他对国内外名作如数家珍,“每一本都可以给我强大的人生安慰”,其中,最喜欢美国作家

内容和形式最与时代大众相近的时段,就是文学最繁荣的时段。

中青报·中青网见习记者 陈宇龙
记者 蒋肖斌

10年前,聚焦工人诗人群体的纪录片《我的诗篇》问世,陈年喜被导演认为是纪录片里“观众最喜爱和最有感触的”一位主人公,他粗粝的嗓音、诗句,与矿洞里的爆裂共同构成奇观。

事实上,那恰好是他矿山爆破工生涯的一声尾音。纪录片片尾交代,他因颈椎病严重接受手术,不能再从事这份工作;后来又确诊了尘肺病,2024年的一档视频访谈节目里,他有时连续说几句话就会剧烈咳嗽。

现在,文学重构了这个曾经的爆破工的生活秩序,他在周末被邀请到长三角、北京等城市,出席各个文学对谈活动,往往又趁夜色赶火车回到陕西丹凤县的老家。当交往对象不再是炸药,他在城市里“对生活的实践产生很不同的理解。他把矿上的日子比作“与整个文坛割裂”,现在则处在“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”,“偶尔走近又保持着某种距离”——他满意这样的状态。

在诗集之外,《微尘》《一地霜白》《人间旅馆》等散文集、非虚构故事集陆续发表,陈年喜保持了创作的持续性。10月,他惊喜地发现,自己的书在“微信读书”上,有4本的网友评分达到了“神作”。不过,这并不代表他可以不再为生

我每写完一本书,都感觉自己重新生长了一遍,也希望里面的每一个人都能重新生长一遍。

中青报·中青网见习记者 蒋欣雨
记者 蒋肖斌

在王柳云的第一部作品里,她将自己的前半生归纳为“青芥人生”。青芥指青萝卜、青榨菜,她在书中写道:“它平凡到不被想起,但又内含辛辣、倔强与坚毅,去病抗逆为家常便饭,由来那么简单且执掌着生息。”

作为一个从“泥土”里成长起来的作家,她像是石缝里的种子,身上既有“与土地相连”的自然质朴,又有“破土而出”的勇敢坚韧。近日,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专访了王柳云。从小生活在乡村,王柳云对于自然有着敏锐的洞察。“小时候看见一块石头、一点阳光,我就高兴得不得了。我愿意一整天坐在沙滩或草地上,对着一株草也可以看半天。这是一种天性,我一定要把我看到的画出来、写出来。”闲暇时,王柳云喜欢在客厅窗边侍弄花草,

换了14份工作,从未放弃写作



陈朴。

受访者供图

菲利普·罗斯的《遗产》。而真正启发他动笔写下自己故事的,是胡安焉的《我在北京送快递》,胡安焉是另一个变换不同职业、在网上进行文学创作的写作者,这本书一经出版便获得好评无数。

陈朴感受到,快递业快速发展的背后,是一个新职业群体的积累,而此前尚未有人为他们而书写,这是《我在北京送快递》畅销的原因。现在,普通人的写作正在补足无数种人生在文学世界的空白。

因为担心读者的审美疲劳,陈朴的书放弃了原书名《我在大学做保安》。他还提出在封面打上“新大众文艺诚意之作”的字眼。在陕西《延河》杂志上,他关注到关于“新大众文艺”的讨论,此后一直持续地关注这个概念被国家级刊物、名人学者重视,这些年,“素人作家”“草根作家”等标签都曾风靡一时。他认为,“新大众文艺”对他来说,首先是一种身份上的认同,其次才是创作题材上的分类。

陈朴无法组织学术性语言加入这场讨论,但向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解释了自己出书的执念从何而起:他身边,一些70多岁的农民作家也希

“矿工诗人”离开矿山的10年



陈年喜。

受访者供图

计发愁,最近,他在微博上卖老家的香菇和天麻。西湖文学院在11月9日揭牌成立,陈年喜也受邀参与一场关于“创作与生存”的对谈。他透露自己遇到了瓶颈期,“原来的矿山生活和家乡生活,都写得够多了,如何打破我个人的写作素材或者写作方式,我一直在考虑、迷茫”。他随后向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表示,自己并不介意仍被大众认为是“矿工诗人”,不过既然投身全职写作,自己一方面需要更加考虑读者与市场,另一方面则要“努力寻找自己的(写作)原料”。

在这场对谈里,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、作家梁鸿谈读陈年喜作品的感受时,也讲到“素人写作”与“职业写作”的关系。“他的散文虽然来自个人的生命体验,但也超越了个人的生命体验,他写的是人类共同的存在状态、困境、情感状态,在这种意义上,陈老师就是个专业作家。”梁鸿指出,应该谨慎地使用“素人作家”这个词,这仅用来说明一种社会现象。事实上,专业指的并非“只靠写作吃饭”,而

是具有足够的理解生活并用语言描述的能力。

今年,关于“素人写作”和“新大众文艺”的讨论正盛,陈年喜也参与了《星星》诗刊的一次讨论,探讨如何打破文学期刊读者与大众诗歌读者之间的隔离与壁垒。

陈年喜以《诗歌,本是大众的事业》为题,提出一个观点——“内容和形式最与时代大众相近的时段,就是文学最繁荣的时段”。他向记者解释,今人与唐人都拒绝绝唐诗,原因在于其“除了形式的美、高度创造和艺术自由,它写到的流离、困苦、喜怒哀乐,也属于我们每个人,那是一种实景”。

陈年喜向写作者呼吁,寻找不同群体对诗歌阅读需求的共性,让诗歌回到现实,回到生活和人心现场,同时也要观照人类未来,好让多年后的人们“从诗歌中看见我们这个时代的细节与影像”。他说,虽然世界日益多元,每个人都在“细分市场”,但根本性的问题永远共通。

近年来一批写真实经历的“新大众文艺”作品广受欢迎,陈年喜的作品也参与其中,他相信每位写作者都会关注和思考这股潮流。他认为,读者对这类作品的阅读兴趣,说明了“个体永远单薄贫乏”,人生无论如何丰富,毕竟历练有限;向文学求索,才能看到更广袤的生活和生命。

陈年喜在不同场合表达过同样一个观点:“文学并不高高在上,它就是生活本身。”“写出生活和生命的丰富性、复杂性,而不仅仅是高光时刻,才完成了文学的精彩。”我们阅读今人与古人的作品,总是试图从中找到自己的生活与生命,找到那个共通与共鸣的点。”陈年喜说。

王柳云:希望像蜗牛一样活着



王柳云在北京新华书店总店。

受访者供图

让自己沐浴在阳光里。如今的王柳云,允许自己“被阳光晒透”。可对于曾经的她而言,阳光也有照不见的角落。在《青芥人生》中,她曾描述自己经历了“黑暗的少年时代”。

1966年出生于湖南新化农村,清贫的家境、父亲的残疾与母亲的严苛,让她从小习惯孤独,也锤炼了坚韧的品格。在困顿的岁月里,她做过很多工作,服务员、保洁员、工人……她用劳动为自己赚取踏实的生活,而读书是她“修补灵魂”的方法。

王柳云热爱读书,尤其热爱古典文学,视传统文化为珍宝。“要从经典中汲取养料。”她说,自己曾读《红楼梦》残卷读到“不舍得放手”,能对书中

典故信手拈来,也读《史记》《春秋》《诗经》。王柳云在书中写道:“读《诗经》里的故事,我感觉自己的烦恼都消耗殆尽了。”她信奉“读书是为了明理”,而读书,也能改变命运。

正因如此,王柳云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都“求知若渴”。年少时,她从县城破旧的图书馆借回《童年》《我的大学》等书。后来,实在没办法读书的时候,她坦言“自己曾拿过女儿的一本《新华字典》读了一阵”。“一开始读书是无意识的。”王柳云说,“后来我慢慢地形成了一些认知,发现读书能够解决很多问题,读书的过程像是在与人‘对话’。”

读书同时孕育了王柳云的“文学生命”,写作,是她为凿穿“生活壁垒”而寻到的另一个“出口”。“要感谢我多年的经历,我才能够深层次地理解那些人生的境遇。”或许正因自己亲身经历,她才能写出那样一个充满磨难而始终生机盎然的“人间”。

在王柳云笔下的“人间”里,每一个人物都灵动、鲜活,有着丰满的血肉,扎根现实的土壤,她将自己称为“小人物”。“我自己就是一个小人物,我不可能写一个大人物出来。”王柳云说。在《走过那



一个文化群体正在被培育,他们释放的创造力,将会是全民诗歌的创造力,最终会带来诗歌的繁荣。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

无论是田间地头的劳作身影,还是城市地铁的匆匆背影,无论是边疆哨所的风雪,还是外卖小哥手机里的家书——你读到了吗,这些真实的生活片段,如今都成为诗的一篇。专业诗人与业余爱好者同台朗诵,外卖员、厨师、农民、工人、学生、教师都是主角——你发现了吗,这些你我身边的普通人,现在都有了写诗的勇气和“天赋诗权”。

近日,在接受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专访时,中国作家协会《诗刊》社主编李少君说,“新大众”的精神内核,正是“人人可诗,诗为人人”。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:新大众文艺范畴中的诗歌,“新”在哪里?

李少君:这些年来,文学在有些时候背离了文学的本质,比如说,为写作而写作,为修辞而修辞,这也是产生很多抄袭问题的原因之一。新大众诗歌,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回到了诗歌的本质,或者说文学的本质。文学的本质,是有生活、有人生,然后有感而发,自古以来皆是如此,古人称之为触景生情,或者说睹物思人。触景生情的“景”,其实就是一种现场感。

新大众诗歌的诞生与发展,有其鲜明的社会背景:首先是新的时代。新的时代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,就是教育的普及,带来文化的普及、诗歌的普及。其次是新的技术。曾经的文学体制是比较“精英化”的、分层级的,但现在有了新媒体、新的传播渠道,诗歌可以直接在网络传播。最后是新的意识,包括文化自信、平视世界等。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:就你的观察,近年来,新大众诗歌呈现怎样的面貌?

李少君:以中国诗歌网为例,这个网站创立于2015年,迄今已有10年。很多新大众诗歌的代表人物,包括王计兵、温雄珍等,都是中国诗歌网早期的活跃分子。这个网站规则简单,只要注册成为会员,就可以自己发表作品,目前,已有60多万注册用户,每天会更新3000多首诗歌。从某种意义上,诗歌写作已经普及化了。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:大约10年前,“工人诗歌”也曾受到关注,后来又渐渐沉寂。现在的“新大众文艺”中,诗歌又占到很大比例,这两者之间的传承和差异是什么?

李少君:工人诗歌的沉寂有一些原因,最主要的就是“打工潮”的退却。过去的工人诗歌比较集中在南方,比如东莞,曾经有那么多的打工者,后来因为当地产业升级、转换等,这个群体就会减少、转移。过去的工人诗歌集中在制造业,新大众诗歌的作者就分散到了各行各业。

工人诗歌兴起时,互联网发展尚早。虽然已经有了一些网络论坛可以发表作品,但文学体制还是牢牢掌握着话语权。现在则不同,很多出名的诗人,客观来说并不是传统的文学期刊发现的,而是在新媒体传播中“出圈”。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:新大众文艺强调大众,而诗歌常被视为高雅艺术,如何看待和处理诗歌的“精英性”与“大众化”之间的关系?

李少君:从《诗经》的“国风”到汉乐府的“饥者歌其食,劳者歌其事”,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“二为”方向到新时代的“为人民抒写、为人民抒情、为人民抒怀”,真正的诗歌始终与大众同频共振。

我们倡导的新大众诗歌,正是要打破圈子化、小众化的封闭状态,让诗歌从象牙塔走向街头的烟火人间,从个人的自言自语变为共情的深情吟唱。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:新大众文艺背景下的诗歌创作,是否形成了一些新的审美趋向?

李少君:新大众文艺背景下的诗歌创作,最大的特征就是质朴,也许有些粗糙,但绝对有冲击力。每一首诗歌都是诗人的真实生活、诗人的人生体验。一首好的诗,背后一定是能说出故事的。文学有一个特点,每到一定时候,就要回到源头重新审视。当AI出现后,有故事的人类面对没有故事的AI,可能有人文学的评判标准就需要被重估。

比如,有人认为王计兵的诗比较粗糙,但我认为他作为一个诗人是成立的、他的诗是成立的,因为它符合诗歌的本质;而且,他的语言是能唤起共情的,也许个别表达是公共化的,但里面有他的个人化的体验。

我经常说,诗人实际上属于比较自我的,因为诗歌本身的主体性比较突出,诗人有时候就会走向一种自恋,或者说自大。如何解决这个问题?可以通过加强修养,提高自己的境界。境界是指认识水平、心灵品位和精神层次,这是可以通过内在的修炼和外在的学习提升的。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:大家普遍看到大众在创作诗歌,那大众是否在阅读诗歌?阅读对新大众诗歌来说是什么意义?

李少君:之前调侃诗人有一个说法:写诗的人比看诗的人还多。我反对,这个在逻辑上就不成立——写诗的人肯定也看诗吧!

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“十五五”规划建议明确提出,“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”。这肯定会在未来影响文学生态的方向,对读者来说,需要通过不断地阅读来提升阅读水平;对同样是读者的创作者来说,也需要通过不断地阅读来提升创作水平。

新大众诗歌:人人可诗,诗为人人